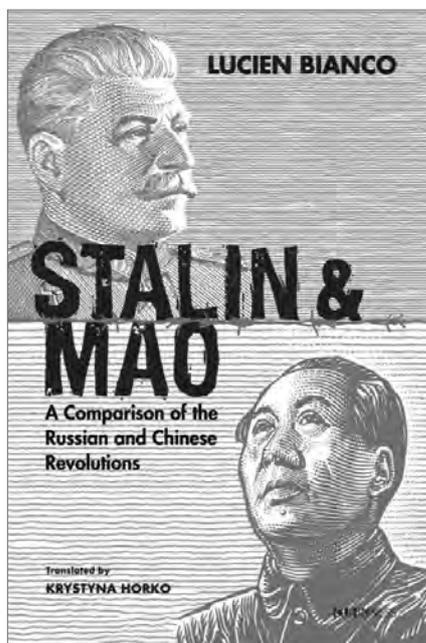


比較中俄革命

——評 Lucien Bianco, *Stalin and Mao: A Comparison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volutions*

● 周陸洋



Lucien Bianco, *Stalin and Mao: A Comparison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volutions*, trans. Krystyna Horko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8).

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革命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成功的共產主義運動。比較兩大革

命的研究汗牛充棟，這些文獻不外乎關注以下問題：兩大革命是否存在本質上的不同？中國在哪些領域突破了俄國革命的原型？這些突破（如果存在）能否防止中國成為第二個蘇聯？如果稍作理論化，這些問題可以表述成：共產主義革命能否在文化歷史背景迥異的社會之間無差異地複製？革命遺產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革命後的發展與改革？中國能否準確解讀蘇聯歷史、汲取經驗和教訓？

回答這些問題並非易事。中俄革命在歷史進程上有很強的不對稱性，學者難以找到準確的切入點進行比較。加上掌握兩種語言又精通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學者不多，因此發現系統性的異同是個盲人摸象的過程。此外，鑒於蘇聯早已解體而中共仍在執政，基於過往歷史所得出的結論能否通過最新時事動態的檢驗，也存在很大疑問。

法國歷史學家畢仰高 (Lucien Bianco) 的近代《斯大林與毛澤東：俄中革命比較》(*Stalin and Mao: A*

中俄革命在歷史進程上有很強的不對稱性，學者難以找到準確的切入點進行比較。鑒於蘇聯早已解體而中共仍在執政，基於過往歷史所得出的結論能否通過最新時事動態的檢驗，也存在很大疑問。

在領袖傳記分析的框架下，作者把中俄革命的比較範圍設定在廣義的斯大林時代和毛澤東時代，認為就政治系統而言，中蘇之間的相似性遠遠大於不同。然而，他忽略了兩國在領袖和政治系統以外廣闊社會背景的差別。

Comparison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volutions，引用只註頁碼)是挑戰上述難題的嚴肅嘗試。在領袖傳記分析的框架下，作者把中俄革命的比較範圍設定在廣義的斯大林時代(1917-1953)和毛澤東時代(1949-1978)，全書分九章細緻檢驗兩個政權在落後程度、經濟趕超戰略、機構設置、農業改造、饑荒問題、官僚體制、文化控制、政治整肅、領導風格方面的異同。作者的基本結論是，就政治系統而言，中蘇兩國之間的相似性遠遠大於不同；中國試圖超越蘇聯自成一派，結果卻是模仿多於創新，在擺脫蘇聯模式的改革上還要走很長的路。

本文從三方面介紹和點評畢仰高的著作：比較策略、核心觀點和當代關切。在肯定此書貢獻的基礎上，本文的批評主要基於方法和理論視角：作者缺少一種系統性的手段來辨析中俄革命之間的相似與不同；在強調中蘇相似性、繼承性的同時，忽略了兩國在領袖和政治系統以外廣闊社會背景的差別。

一 比較策略：聚焦政治系統的相似性

中俄革命是否可以比較？許多比較歷史學者的回答恐怕是：「不能」。根據最寬泛的比較，兩大革命在歷史進程上包含了諸多共同元素：城市工人運動、內戰、反擊外來干涉、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等。然而，這些元素進入歷史的方式在次序、速率、時點上有很大不同。布爾什維克的社會革命始於1917年「十月革命」，而中共在1949年勝利以前就有長達二十二年的根據地階段，革命早於建國。中俄革命最終都以贏得內戰取得政權，布爾什維克在三年內以最殘酷的方式快速消滅白軍，而中共與國民黨的爭鬥則從1927年持續至1950年代初期，時戰時和，綿延二十餘年，抗日戰爭期間也沒有完全停止。又比如，布爾什維克在奪取政權以前沒有對外戰爭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還宣傳戰敗主義，以求造成沙俄政府崩潰；而中共則在抗戰時期與



中俄革命是否可以比較？(資料圖片)

日本軍隊有過真實交鋒，並且積極塑造祖國保衛者的形象——蘇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有相似經歷（內戰期間外國武裝干涉極其有限，甚至遠不能與美國對朝鮮戰爭的介入相比）。

這種比較上的不對稱性還表現在：一場革命中至關重要的元素，在另一革命中幾乎找不到對應事件或經歷——在革命領袖集團的層面尤其如此。比如，由於民族結構和展開革命的地理區域的差別，族裔政治在布爾什維克政治議程中佔據中心地位，在中共革命中只扮演邊緣次要角色。又比如，由於布爾什維克和中共地緣政治地位不同，前者與沙俄舊軍隊的關係疏離甚至隔絕，和中右翼政治派別也幾乎沒有交往；而後者脫胎於民族救亡運動，又因為長期戰爭，與國民黨上層、地方強人有着廣泛的同學、共事關係和私人情誼。由於舊政權歐化程度的差異，布爾什維克沒有經歷過中共1927年所遭遇的反革命大屠殺（國民黨清黨），建政以前的被迫害經歷以監禁、苦役和境外流亡為主。此外，中共得到蘇聯的指導和援助，而布爾什維克只有遙遠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和1848年「民族之春」革命可以借鑒。在領袖層面，中共既沒有列寧這種長期領導革命、建政不久就離開人世的元老，也找不到貝利亞（Lavrentiy P. Beria）這種具有較強技術官僚才幹的秘密警察首腦。

針對這種不對稱性，已有的比較歷史研究存在四種解決之道^①：

第一種方式是忽略歷史進程，只考慮導致革命成功的結構性因

素。比如，美國社會學家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認為精英和意識形態無關緊要，指出三個結構性因素（舊政權的鎮壓能力在戰爭中崩潰、農民的組織化程度高、舊政權的改革受阻）共同導致了共產主義革命在中蘇兩國的成功。

第二種方式以歷史社會學家安德森（Perry Anderson）為代表，避免定義兩大革命清晰的因變量和自變量，甚至也不去界定甚麼是「共產主義革命」，只是鬆散地敘述兩個宏大的歷史過程，並伺機進行一些零散的對比和解釋。

第三種方式是捨棄宏大歷史關切，只選取可以把握的細微局部。這一路徑的代表是英國比較歷史學家史密夫（S. A. Smith）。他的研究聚焦於聖彼得堡和上海的工人，分析兩者在性別觀念、消費行為、政治態度以及與農村故鄉的聯繫等方面的異同。

第四種方式是不問是否有可比性，分門別類地比較革命政權的制度與政策——這種做法常見於不同領域學者合作完成的編著，比如特雷戈德（Donald W. Treadgold）主編的《蘇聯與中國共產主義：相似與不同》（*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畢仰高的比較策略是對上述四者的借鑒綜合。在分析層次上，本書採用了傳記框架，聚焦於兩位革命領袖，明顯模仿了普魯塔克（Plutarch）的《希臘羅馬名人傳》（*Parallel Lives*）和布洛克（Alan Bullock）的《希特勒與斯大林》（*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不同於普魯塔克忽略歷史背景而一味追求

作者在論述上基本捨棄了布爾什維克1917年以前的歷史，對中共1949年以前的歷史也只作了背景性介紹。其筆下的「革命」僅指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後的社會重塑，也明確剔除了那些在中俄革命之間分布嚴重不均勻的元素，哪怕它們極其重要。

作者擬定了高度對稱的分析框架，並將其嚴格聚焦在中蘇兩國共有的、能夠集中反映極權主義特點的制度和政策上，還發展出一套通行於中蘇的歷史分期，通過共性比較策略提出了主要觀點：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能實質性超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

道德褒貶，作者把重心放在傳主的經濟政治決策上，而且力求通過具體個人看到宏大革命進程^②。同樣，不同於布洛克詳析傳主生平的手法，本書雖然以兩位領袖為標題，卻只用了第九章來比較兩人的履歷、品格和行事風格，其餘篇幅都是對政策和制度的描述。本書的分析方法也不同於一度流行的古典「集體傳記法」(prosopography)。作為西方研究蘇聯和中國的起點，這種方法試圖通過大量領袖傳記的疊加分析看到超越個體人物之上的制度特徵^③。冷戰時期，因為陣營敵對、共產黨領導人的傳記細節難以獲得，「集體傳記法」以數量來彌補深度上的缺陷。本書顯然是反其道而行之。

在研究取態上，作者雖然考慮長時段進程，卻在時間範圍上作了大幅裁減，基本捨棄了布爾什維克1917年以前的歷史，對中共1949年以前的歷史也只作了背景性介紹。他筆下的「革命」僅指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後的社會重塑，也明確剔除了那些在中俄革命之間分布嚴重不均勻的元素，哪怕它們極其重要。比如，他沒有分析1941至1945年的蘇聯衛國戰爭(蘇德戰爭)，因為這一事件就其對抗強度、破壞性和持續影響而言，在中國(以及其他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找不到相近案例。他也沒有分析民族政策，因為中國少數民族佔總人口的比例很低，民族問題不是社會變遷的主要動力。此外，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也是作者迴避的話題：蘇聯是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是，而且後者並無面臨納粹德

國入侵那樣迫在眉睫的外部威脅。作者甚至擯棄了對工人階級的分析，認為這個名義上的統治階級在兩大革命中的作用根本上無足輕重(頁xxiii-xxiv)。

最重要的是，本書仍然包含了主流比較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可比性」執念：作者擬定了高度對稱的分析框架，並將其嚴格聚焦在中蘇兩國共有的、能夠集中反映極權主義特點的制度和政策上，即經濟趕超戰略、農業集體化、剝奪舊特權階級的平均主義、官僚機構和等級制的塑造、對知識份子和文化生產的控制、政治整肅，以及領導人掌握絕對權力。為了讓比較盡可能對稱，作者還發展出了一套通行於中蘇的歷史分期，試圖給每一個被分析的蘇聯時期找到相對應的中國時期。比如，他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大躍進時期相當於蘇聯的一五計劃：兩者都在極度缺乏經驗的情況下推行，都受到內戰時期革命英雄主義的驅動，都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災難性社會後果(頁31-34)。

在這樣一個時空高度對稱的「可比性」框架下，作為歷史學家的畢仰高，在論述中又試圖保持靈活性，避免忽視枝節層面的差別。比如，作者強調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在蘇聯和中國都有急於求成、犧牲質量以追求數量、排斥專業規劃的特點，但卻在稍後具體指出，蘇聯的社會反抗比中國劇烈得多，因為蘇聯把土地集體化、去富農化、摧毀教堂三大運動合併執行，而俄國農民在村社的組織下又有強大的自發反叛傳統(頁25-29、121-22)。又比如，作者認為農業集體化在中

蘇兩國造成饑荒的機制沒有本質區別：政府受到虛假數字蒙蔽而在饑荒期間繼續強力徵收糧食，地方為表達政治忠誠而競相虛報作物產量，但繼而補充說，蘇聯的饑荒分布具有明顯的民族性特徵（80%的死亡人口是烏克蘭人和哈薩克人），中國則不明顯（頁154-56、163-65）。在均等化政策上，作者認為兩個政權都在剝奪舊特權階級、向工農階層轉移教育和衛生資源，但中國的措施有明顯的逆城市化取向，如大躍進之後向農村疏散人口、文化大革命期間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而蘇聯的類似措施被接連的內戰、饑荒和對外戰爭抵消（頁43-45）。

綜上所述，考慮到中俄革命比較的特殊困難，作者的比較策略雜糅了多種既有方法，富有智慧。然而，總體來看，這種比較方法仍過於謹慎，為追求對稱、可比、具體而犧牲分析上的靈活性和視野上的廣闊性。當然，作者的目標正是強調中俄革命的共性。通過共性比較策略，作者提出了他的主要觀點：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沒能實質性超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

二 核心觀點：中蘇繼承多於改變

中俄革命在時空上高度接近並且有着緊密的師承關係，因而大大不同於彼此沒有直接干預關係的美國、法國革命，也不同於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它遙望的法國巴黎公社運動或「民族之春」革命。研究者的分歧在於，中俄革命之間的師承關

係究竟達到甚麼程度？經典的政治經濟學代表了相關分析的一個極端，認為所有社會主義體制都是對蘇聯模式的複製學習，彼此沒有本質差別，共同受某些內生的矛盾關係（工人階級與再分配精英之間、技術官僚與黨務幹部之間、計劃經濟的不可能性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需求之間）驅動並大體沿着相同軌跡發展^④。而區域國別研究則代表另一個極端，認為中共（還有朝鮮等亞洲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學習蘇聯，卻在許多重要方面有質的創新。這些創新在革命時期就已經產生，部分來自於中國的歷史傳統，部分來自於中共獨特的革命進程，對兩大政體後來的命運也有深遠影響^⑤。

本書作者的立場接近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制度研究，卻提供了更豐富的信息，致力於揭示作為模仿者的中國擺脫作為原創者的蘇聯時面臨的痛苦和挫折。他認為中國試圖超越蘇聯，但這些努力不是失敗就是流於表面，因而只具有宣傳和符號意義。他挑戰的第一個流行觀點是「中國比蘇聯更加追求平等」，這一觀點自美國歷史學家邁斯納（Maurice Meisner）以來就一直存在着廣泛的影響，強調中共的政治思想含有反對等級制、排斥技術專家、貶低專業官僚機器的民粹主義氣質，並推論這一特點是道家辯證思想、無政府主義、長期農村革命的經歷以及與蘇聯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等多種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⑥。作者則指出，這種差別很大程度上是流於文本層面的。中共的群眾動員固然把「兩條路線鬥爭」放在一個顯要的位置，卻和蘇聯

作者的立場接近經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制度研究，認為中國試圖超越蘇聯，但這些努力不是失敗就是流於表面，他挑戰的第一個流行觀點是「中國比蘇聯更加追求平等」；對於中共是否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政治規劃方法，則有所保留。

作者的比較方法是追溯師承關係、尋找相似性。至於蘇聯的「相似案例」是否實施過，達到何種程度、範圍和深度，作者所提供的證據和論證非常有限，也沒有細緻呈現某個觀點、政策或模式從蘇聯傳遞到中國的過程。

一樣，不承認民眾不經由黨的外來領導可以實現自我解放(頁66-67)。

就社會改造戰略而言，作者認為中共一貫模仿蘇聯，對於超越蘇聯則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毛澤東最初試圖複製蘇聯的一五計劃並有所加強，但由於信息局限，他當時並不了解蘇聯的後兩個五年計劃比一五計劃更審慎；這種複製很快演變成大躍進並且造成大饑荒(頁31-34)。此後，毛澤東的注意力從經濟趕超戰略轉向教育和衛生領域的均等化，試圖偏離蘇聯的實用性專業技術教育路徑。作者認為這方面的努力固然在消滅流行病、降低嬰兒死亡率、基礎掃盲方面取得了公認的巨大成效，其代價卻是整個國家教育科研質量的下降(頁34、48)。斯大林的趕超戰略更有效率是因為蘇聯的目標單一(不惜一切代價在最短時間內建立一套國防工業)，而中國同時追求趕超和平等，分散了本來就有限的資源(頁317-18)。作者反覆提及的觀點是，由於中國的經濟社會基礎更加落後，複製和試圖超越蘇聯模式的行為並沒有成功的可能——這就是為甚麼中共對農民的熟悉沒有轉化成為其農村治理優勢。

作者着重探討的第二個主題是中共是否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政治規訓方法。許多研究者對此持肯定態度，比如中共在革命戰爭中形成的「整風」、「訴苦」、「三查三整」，以及文革時期不尋求肉體消滅而注重思想規訓的做法，在蘇聯似乎沒有明顯的相似現象^⑦。作者對這一流行的看法有所保留。他認為，以強制體力勞動對公民實行再教育

的設想是布爾什維克提出的——高爾基(Maxim Gorky)和雅果達(Genrikh G. Yagoda)都有過類似表述(頁279-80)。至於中共以主觀政治表現而非客觀社會出身來定義階級的手法，在蘇聯其實也早有先例——反對農業集體化的人都被斯大林貼上了「富農」標籤。當時真正的富農、地主已經所剩無幾，被貼上標籤者是一個包括民族語言教師、貧下中農、退役紅軍戰士、神職人員、鄉村店員在內的廣泛群體(頁67-72、86-89)。作者尤其反對文革是中國革命內部革命的說法，認為就掃除政敵的效果而言，它和蘇聯的「大清洗」根本沒有區別(頁328-29)，而思想改造在文革中後期已經逐漸失效，與蘇聯「古拉格」激化異見運動的機制類似(頁289)。當然，作者沒有完全否認中蘇兩國之間的差別，但強調差別只呈現在執行細節等方面。他承認蘇聯的肅反更審慎、可控，限定由行政機構執行行政令，文革則沒有清晰的目標指向，而且幾乎是全民參與(頁330)。他還指出中國的勞改運動包含着制度化的「政治學習時間」，而蘇聯似乎沒有這種安排(頁282、329)。

可以看出，作者的比較方法是追溯師承關係、尋找相似性，類似思想史上的「從馬克思追溯到柏拉圖(Plato)」或「從托爾斯泰(Leo Tolstoy)追溯到達爾文(Charles R. Darwin)」的說法。既有文獻往往說明中國在某方面的獨特性，他則針鋒相對地指出這種現象在蘇聯也存在，並且在源頭上可追溯到蘇聯。至於蘇聯的「相似案例」是否實施過，達到何種程度、範圍和

深度，是否具有統計學上所說的「顯著性」，作者所提供的證據和論證非常有限——本書俄國部分的參考文獻多是轉譯為法語的二手著作。本書也沒有像一些跨國史研究那樣，細緻呈現某個觀點、政策或模式從蘇聯傳遞到中國的過程^⑧。當然，作者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缺陷。正是為了克服翻譯資料可能造成的觀察偏差，他細大不捐地呈現中蘇兩國之間所有的差異，有時甚至到了瑣碎的程度——蘇聯的集體農莊看重拖拉機、集中營裏有更多外國人；中國的文化官僚只佔據文化職務、幹部比較窮，等等（頁111-12、184-85、232、256）。通過羅列差異的枝節性，反過來彰顯了共性的首要地位。

比較方法上的缺陷還來自於本書的裁剪策略。得益於相對狹窄的時空限定的傳記分析框架，作者的結論的確可以在自我設定的範圍內成立。但是眾所周知，兩位革命領袖的政治生涯漫長而且觀點多變，在他們之間發現差別與相似性幾乎一樣容易。如果把研究進一步擴大到兩個複雜的革命進程和廣闊的社會系統，相似和不同的關係就會有更大變數。如果沒有一定的理論理想類型作為先導，單純的古典傳記對比並不能找到系統而顯著的差別^⑨。

三 當代關切：中國是否已經偏離蘇聯模式？

比較中俄革命難以迴避當代關切：究竟中國是否已經偏離了蘇聯道路？這一追問包含着極為複雜的

內涵。所謂蘇聯道路包含着兩個交織的歷史進程：制度的內生特性、非制度性的歷史文化社會和國際背景。對中國前景的判斷，自然也不能脫離其中一個方面。作為一本嚴格限定了分析對象的比較歷史著作，作者不可能同時探討這樣廣泛的問題，但書中的一些觀點，卻反映了作者的時代思考。

作者回應了1978年在多大程度上算是一個歷史斷裂的問題。多數學者承認，毛澤東病逝之後，中共暫時找到了一條道路，能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持威權政體。然而這條道路與過去究竟有多大區別，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改革開放不過是中共獨特的革命經歷的再現，比如根據地的分散管理、新民主主義時期管理多元政治經濟的經驗等。其他學者則認為，它是對革命的否定^⑩；正是「告別革命」、放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執迷，使中國能夠利用和抓住種種有利的結構條件和外部機遇（單一的民族成份，勤奮的廉價勞動力，充沛的來自港台華人、海外華僑和西方的投資），創造了蘇聯所不能創造的奇蹟^⑪。作者傾向於「告別革命」的觀點，他認為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否定：如果中國延續毛澤東時代反城市化、反專業化和反精英化的道路，它只會繼續貧窮，所謂均等化只能維持在很低的社會發展水平上（頁49-50）。他承認改革開放的一些成功經驗起源於毛澤東時代，比如小型農村工業、農村水利設施、農業機械和化肥的使用，但認為這些發明在當時或者只是剛剛開始，或者因為處在不利的制度環境下而充滿破壞性（頁32-34）。

中國是否已經偏離了蘇聯道路？作者回應了1978年在多大程度上算是一個歷史斷裂的問題。他傾向於「告別革命」的觀點，認為改革開放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否定。但他仍然更多地強調中國在1978年前後的歷史連續性。

對於民族關係、地緣政治地位、宗教文化傳統這些先於革命存在、卻長久籠罩着共產主義政體的帝國遺產，本書幾乎沒有涉及——這些正是作者在開篇就聲明要剔除的可比較對象。他尤其忽略了民族主義與革命的關係。

但是，作者仍然更多地強調中國在1978年前後的歷史連續性。比如在人事繼承上，他認為「大清洗」和文革的遺產大不相同。「大清洗」以肉體消滅方式永久清除了「十月革命」的老幹部，代之以大批受過專業教育的年輕技術官僚。這些人在革命後參加工作，意識形態相對淡漠，但經歷過工業化、衛國戰爭和戰後重建的鍛煉。在他們成為統治者的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時期前後，蘇聯完成了結束「大清洗」恐怖、意識形態褪色、官僚機構取得獨立性並成為利益集團的關鍵歷史轉變。相反，文革根本沒有為中國留下長期而持續的人事遺產：不論「造反」起家的王洪文還是像華國鋒這樣短期晉升的領導人，在毛澤東去世後一概被黜退；改革開放時代執政的是文革中被打倒(而未被處決)、文革後再次登場的老幹部以及他們的後代(頁335)。

作者對中國模式的樂觀也是謹慎的。他在結論中提醒讀者，如果說革命遺產在蘇聯解體後的俄國已經得到清算，那麼在中國，革命話語並沒有遠去，還原真實的革命歷史還面臨很大挑戰(頁349-50)。作者也考慮了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認為中國知識份子更馴服。中國有科舉制傳統，知識份子追求融入政權為之服務。俄國那種自普希金(Alexander S. Pushkin)、果戈里(Nikolai V. Gogol)以來與政府疏離的異見思維，在中國難以獲得廣泛共鳴。近代中國的民族屈辱也讓知識份子對政府抱有更大的寬容(頁9-12)。

遺憾的是，作者並沒有把對社會背景的分析延續下去。對於民族關係、地緣政治地位、宗教文化傳統這些先於革命存在、卻長久籠罩着共產主義政體的帝國遺產，本書幾乎沒有涉及——這些正是作者在開篇就聲明要剔除的可比較對象(頁xxi-xxii)。他尤其忽略了民族主義與革命的關係。沙俄是多民族帝國，為了奪取和維持這個帝國，布爾什維克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超民族闡釋：一方面容許各個民族保留語言文化和認同，另一方面以計劃經濟和階級意識形態維持非民族國家(non-national universal state)。這就造成了蘇聯的政治脆弱性：隨着民族認同日漸成熟而計劃經濟愈發僵化，蘇聯這個看似頗具威脅性的龐然大物一遇到外部困境，就會像巧克力板一樣塊狀散落、平靜解體^②。中共革命的背景與此完全不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興起時，中國已經進入後帝國時代，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早已經開始。共產國際的支持、與國民黨的競爭、抗日戰爭的洗禮，以及「百年屈辱」的文化驅動，使得中共革命與民族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③。這種共生關係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賦予中共極大的意識形態調整空間——在世俗、鬆散、缺乏具體社會綱領的民族主義話語框架內，幾乎任何調整都可以得到道德合法性的支撐。隨着國力邁向巔峰，中國正和世界產生愈來愈多的衝撞，靈活的民族主義曾經和將會給中國和國際社會帶來何種影響，尤其值得比較歷史學者關注。

四 結論

若按照通行的比較歷史研究標準，畢仰高的著作並不盡善盡美，甚至可以說有不少「硬傷」。它雖然進行了對稱性比較，卻沒有界定一個清楚而合時的個案間差異（比如為甚麼中國走上了市場經濟改革道路而蘇聯沒有），而是大篇幅敘述中蘇的相似性，努力論證兩國並不存在一個因變量。在選取比較時段上，本書也採取了一種簡單的剪裁方法，忽略兩大革命在進程上的差別，一方面淡化中共1949年以前的歷史，另一方面把斯大林時代晚期早已成熟的體制納入革命進程來分析。在辨析中蘇相似性時，本書又缺少俄文原始資料的支撐，存在從中文和法文資料建構和猜測蘇聯情況的傾向。

本書的主要不足正是它有意忽略的比較內容。即便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領袖和政治系統仍然只是社會變遷的動力之一：經濟、軍事和文化意識形態權力共同構成的網絡也在參與社會重塑^①。在共產主義政治制度以外，中俄的差異是巨大的：俄國有更強的民族多樣性，文化和地理上更接近西方和基督教文明，戰爭和外部關係在社會變遷中明顯扮演更重要角色。俄國在多樣性、規模和發展驅動力上接近一個帝國（empire），而中國則更像一個類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作者在第一章介紹兩大革命的社會背景時完全忽略了這一維度，而是用「落後性」來強調中俄的無差別。這就忽視了共產主義政體長期鑲嵌於不同社會民族背景中可能產生的社會差異。

雖然存在一些缺憾，畢仰高的作品仍然具有鮮明的貢獻。它強調了中俄革命的幾個重要事實：領袖在塑造政治系統和社會進程中的重要性，中國對蘇聯模式特別是政治系統的繼承性，以及蘇聯模式跨越時空和文化傳播的超強生命力。作者開創的研究方法也提示了中俄革命比較的挑戰和難度：長時段產生的多樣性、進程上的不對稱、因革命輸出造成的廣泛互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書的資料非常詳細全面，涵蓋了北美、歐洲和中國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別是法語世界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對社會主義歷史和當代中國政治感興趣的讀者，都可以從本書獲得有益的啟發。

俄國在多樣性、規模和發展驅動力上接近一個帝國，中國則更像一個類民族國家。作者忽略了這一維度，而是用「落後性」來強調中俄的無差別。這就忽視了共產主義政體長期鑲嵌於不同社會民族背景中可能產生的社會差異。

註釋

①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erry Anderson,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no. 61 (January-February 2010): 59-96; S. A. Smith, *Revolution and the People in Russia and China: A Comparativ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Donald W. Treadgold, ed.,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② 關於對普魯塔克的分析，參見 Joseph Geiger, "The Project of the Parallel Lives: Plutarch's Conception of Biography", in *A Companion to Plutarch*, ed. Mark Beck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4), 295-301。關於布洛克就領袖人物與政治社會後果的分析，參見 Alan Bullock,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New York: Knopf, 1992), 976-78。

③ 關於美國歷史學者對俄國革命運動的集體傳記分析，參見 David C.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 6。中國相關研究的早期作品，以 Robert C. North,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為代表。

④ Ludwig von Mise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Classics, 1981); János Kornai,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⑤ 比如 Steven Saxonberg, *Transitions and Non-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Regime Survival in China, Cuba, North Korea and Viet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⑥ 代表性的觀點參見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⑦ Elizabeth J. Perry,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al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 no. 2 (2002): 111-28; David Priestland, *Stal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Mobilization: Ideas, Power, and Terror in Inter-War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16-31。

⑧ 關於中國學習蘇聯，較完整的研究參見 Edward P. Bernstein and Hua-yu Li, eds.,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⑨ 關於理想類型的比較，參見 Matthew Lange, *Comparative-Historical Method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3), 105-107。

⑩ 關於這一爭論的概要，參見 Wang Chaohua, "The Party and Its Success Story: A Response to 'Two Revolutions'", *New Left Review*, no. 91 (January-February 2015): 5-37。

⑪ Dingxin Zhao and John A. Hall, "Social Power and Pattern of Late Development: Resolving the Crisis of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28, no. 1 (1994): 220。

⑫ 關於巨型帝國和平解體在人類歷史上的罕見性，參見 Michael Mann and John A. Hall,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Conversations with John A. Ha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89-90。

⑬ 關於中共革命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參見 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7-13。

⑭ 關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意識形態四種權力網絡的互動，參見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